

東歐社會文化的變遷

李界平

——從「蘇維埃化」到民族文化的復蘇

(一) 前言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以觀，東歐實在和整個歐洲有着深切的文化上的血緣關係，學者以爲「東歐的過去在西方而現在在東方，頭腦在東方而肚皮在西方」，實最爲適切。希臘、土耳其、義大利、奧地利、德意志、法蘭西都會先後成爲東歐古老大陸的主人或涉足其上，並且在這裏植下各別的文化種子。拜占庭的軍隊會簇擁而來東方正教的神祇，德意志的武士也衝護過天主教的偶像，這兩種勢力的對峙歷數百年迄今仍宛然猶存。東歐各民族就是在這樣紛歧複雜的環境條件的影響圍限之下，憑藉其強韌的生命力，綿延發展各具特色的文化（註一），並且沾有濃厚的歐洲傳統，成爲歐洲文化主流的一個旁支。

任何一個征服者的偉大事功已是昨日黃花，而從長遠的觀點言之，他們移植下的外來文化，雖然殘存了或深或淺、或多或少の影響，但同時也只是豐潤了東歐文化的面貌，充實了東歐文化的內容。奧圖曼、拜占庭等顯赫的帝國已爲歷史所朦朧，納粹德國的敗績猶在不遠，今日的俄羅斯實又已重蹈覆轍。東歐各國現在已經掙脫了十月革命的鐵靴，經由分別的途徑，踏着不同的步幅，跟隨民族主義的旗幟，走向「社會主義」，也探索自己的出路。以下，將循序討論蘇聯謀求改變東歐各民族文化的企圖和努力、所遭遇之抗力、及東歐民族文化復蘇的新貌。

(二) 東歐文化的「蘇維埃化」

第二次大戰之前，蘇俄偏處邊寒，實力未充，在德軍炮火壓迫之下，幾

不克自保。迨及戰後始因利乘便，肆意擴張，東歐諸國之納入其勢力範圍，亦僅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兩年間事耳（註二）。

蘇聯在統治之初，約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實視各國爲成員共和國，俄籍顧問充塞在警察、軍隊及其他機關，各國政府則直接聽取莫斯科訓令，從事戰後重建及國家工業化，以供應蘇聯必要物質並加強蘇聯軍事資本。至於文化方面，則採取所謂「日丹諾夫（Andrei A. Zhdanov）路線」或「文化上的日丹諾夫主義」，奉行以下三大方針：

第一、一切作家和藝術家必須爲加速工業化和進行革命事業貢獻其才智，以謀社會主義的實現。

第二、要低貶西方生活水準及文化成就，爲此，必須迫害宗教、建立鐵幕，以斷絕與西方接觸。

第三、亦即所謂日丹諾夫主義的用心所在：要以蘇聯文化爲基本模式，以俄語爲日用語文，爲此，乃須在教育制度與課程內容上作巨幅的更張。以下更分述之：

一、關於「社會主義」的實現

我國一般對共產國家的了解，常常將「目的」與「手段」混爲一談。所以近年來東歐各國施行若干緩和措施之後，其共產國家的色彩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彷彿沖淡了許多。但實際上，我們至少可以這樣概括地說：所有的東歐國家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從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儘管其所採取的方法和所選擇的途徑前後有所不同。

蘇維埃化時期，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所有作家和藝術家的任務被限定爲：爲共黨所遭遇的種種困難粉飾一層虛偽的樂觀色彩，爲社會塑造英雄式的所謂典型人物，以加速社會主義的實現。黨並進而控制作家創造性的活力，

任何作品必須接受黨思想「指導」的過濾，並於出版時經過檢查。

儘管黨的控制如此嚴苛，檢查制度又如此週密，但一方面由於黨的政策時而游移不居，每至無所適從，而作家在傳統文化之下所孕育的創新能力事實上又難以有致干預，故這一時期的東歐，不論小說、戲劇、美術、音樂都是教條模式下的八股產物，鮮有堪值一談的作品問世。另一方面，由於創造慾所引起精神上的需求，和在受壓抑下反抗情緒和解放心理，許多作家都持一有自好的作品手寫本私相傳閱，這種暗潮以在匈牙利、波蘭最為洶湧，及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政制解體，東歐開始文化「解凍」，才很豐富地公諸於世，其後兩國一九五六年十月之革命和暴動，似即以此為誘因和激素。

二、文化孤立政策

僵硬的圍牆、猙獰的鐵絲網、冷酷的哨兵，構成共產國家物質的鐵幕。而檢察制度的網羅、個人思想行動之滯礙和飽受限制則構成其精神鐵幕。爲了使人民陷於孤獨、貧乏、疑慮與恐懼之中而後加以玩弄擺佈，蘇聯在東歐施行文化孤立政策而造成的精神鐵幕，至少有三種作用：①使與外界文化隔絕，②使東歐各國相互孤立，③使「現在」與「過去」脫節，或根本遺忘過去，沒有過去。

連篇累牘載滿冗長演說詞的黨報是唯一「消息」來源。各國雖無明令禁收西方廣播，但密集設立的干擾台使西方電波往往無法深入各大城市。西方廣播又被視作「謠言」，而傳播謠言之處罰則法有明文，如此深文周內入人於罪，共黨統治之用心實亦堪憐。

西方任何學術或其他作品，除有關物理學、數學者外，一概不得入口，知識份子心靈的門戶全遭閉塞。唯抨擊西方的作品則大量翻譯流通，古典戲曲僅容其「無害」者上演。外國旅客必有一「嚮導」陪侍在側亦步亦趨，本國人民除奉派代表出國外，終身難跨越舊土一步。

各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則被有計劃、有系統地指爲法西斯主義、盲目的愛國主義、資本主義、或基督教的，馬列主義是唯一評價過去的準繩，俄羅斯文化披上共產主義的外衣竟閃耀着人類的光輝。在匈牙利、羅馬尼亞等非斯拉夫國家，更極力誇張渲染其所受斯拉夫影響。總之，蘇聯所處心積慮以謀者，是使東歐成爲其獨佔的殖民地，使東歐人民無助地俯首爲其極權統治下的順民。

三、對宗教的迫害

對任何共產國家，宗教都是一種主要的思想和意識上的衝擊浪潮，宗教是「人民的雅片」，所以列寧自始指出「馬克斯主義是唯物主義，對宗教是毫不仁慈的」。蘇維埃化時期，東歐國家對宗教的迫害乃是一致的，僅視教派而有輕重緩急之別。大體說來，東方正教受害最輕，天主教較重，猶太人則被視爲一宗教集團而受害最烈。

東方正教係國家設立，歷史上長久附從國家統治，向少涉及俗事，教會團體間聯繫亦少，故其禮拜不受禁止，但修道院悉遭關閉，教堂不許整修新建，經費常遭剝奪，政府態度更明顯表示宗教是落後時代的殘餘。

至於天主教，由於其國際性及右傾作風鮮明，加以一九四〇至四四年間南斯拉夫 Croatia 地方的 Ante Pavelic 政權即係受天主教教士支持而成立，故處境較正教艱難。在教徒較多之國家，教士常遭逮捕鑄錮，主教職位在官方壓力下後繼無人，神職之任命每受政府控制，慈善活動之限制甚嚴，與教廷的聯絡彷彿若藕斷絲連，其他經費人事各方面的困擾，在無神主義的口號下，更層出不窮。

猶太人的才智和資產雖然是工業化政策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但對猶太人的歧視幾已蔚爲風氣，尤其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復國，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均思返以取得國籍，這種敵視遂表現得更形尖銳。猶太聚會所被關閉廢棄，祭祀用品來源斷絕，希伯來文、意第緒語（註三）書報一概停刊。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諸國共產黨藉猶人每因忠貞可疑慘遭殺戮，僅多瑙河以南及波蘭境內猶太人處境略佳。

四、教育方面的更張

此時期教育上之更張，約之不外三端：重量不重質、偏重理工科技訓練輕忽人文社會科學、加強黨的控制。

由於工業化的要求，需要大批職業技術人員，理工科比重自然增加，復以放寬貧下家庭子女入學標準，學生經常投入工農業工作，各國教育水準乃急遽下降而遠遜於西歐。

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則充分顯露「俄化」作風。課程表俄文列爲必修，蘇聯文學、科學各方面成就的介紹被加重。全部採用馬列主義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精神病學均遭廢棄，研究無門。巴伏洛夫的心理學則

係官方「立案」，獨獲寵幸（註四）。

各大學所受政治控制極嚴苛，教授團爲黨權籠罩，思想不穩的教授遭受監視。學位的頒發將審核學業成績外，更視思想忠貞爲條件。青年團勢力披猖，幾可干預校內一切行政事項。

(三) 反抗勢力的興起

文化本是一種和緩漸進潛移默化的力量，史達林暴政統治時期，東歐人民對外來加諸其身的蘇維埃文化政策或可屈從於一時，但這種政治強力的束縛一旦鬆懈，便兆示着文化的解凍。我們可以這樣說，自一九四四年以來，東歐國家政治上所容許自由的大小每限制着文化活動，反之，文化因素亦常刺激或推動政治的解放。

史達林之死與後繼者所採用的新的、較和緩的統治方式，容許東歐文學家、藝術家們得到較寬暢的活動空間，高速工業所引起社會結構的遞變，更從根本處腐蝕了蘇維埃化的基礎，加以國際共黨陣營的分裂，匪俄鬥爭的日漸昇高，使各國得以在共黨理論的矛盾及相互鬥爭的夾縫中，尋求自己的出路，呈現其傾向西方的歷史情感，並且在文化上顯露其民族特色。

顧自一九五〇年迄今，東歐文化發展主要受到來自兩個不同方向反抗因素的影響，一是本土的，如新階級的形成、代間緊張與青年問題、貶史運動的餘波。一是外來的，如西方廣播的滲透、觀光事業的興起與文化交流的影響。這些反抗勢力的存在，一方面構成蘇維埃化政策的絆腳石，一方面又使東歐走向自由化和西歐化的脚步更爲輕快。

一、關於「新階級」

所謂新階級其組成份子與社會上原有的白領階級並無不同，包括知識份子、工業人才、公務員、軍人、黨務人員等。但由於教育水準普遍低落，政治要求凌駕乎學業成績之上，新階級的素質程度較以往社會上層或統治階級爲低。同時，基於黨的決策，無產階級及農民在新階級中所佔比例逐日升高而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高漲，則使其種族成份大爲劃一。

在與蘇聯脈絡相承的教條主義之下，新階級對黨的態度却是面和心離陽奉陰違。他們大多是機敏的機會主義者，以黨爲個人安全的護身符，藉黨的

便利謀求本身事業的開展，以至於黨不得不修訂課程、增設學校，加強馬列主義訓練。更具體地說，新階級大都關心自我生活的改善，相信並嚮往資本主義西方的優越，具有根深蒂固的「歐洲性」(Europeaness)，厭惡檢查制度及對國外旅行的限制，反對政府的警察恐怖手段。

另一方面，新階級又具有強烈的、甚至是盲目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贊同工業國有，對現階段所已呈現的工業化的成果感覺滿意，認爲社會安全制度的建立及大學教育自由化的推進都不妨由國家主其事。他們又以爲：如果排除蘇俄的干與，則一切將有更大的成果。事實上，蘇俄的干涉在各國早已引起程度不同的憤懣。

二、代間緊張與青年問題

許多跡象顯示，共黨對東歐第二代人民的教育是失敗的。最爲人所熟知的例證，是西方爵士音樂對東歐青年似乎有着最深的「迷醉」作用，日丹諾夫雖然認爲爵士音樂是資本主義社會腐化的產品，各國早期亦採取各種措施嚴加禁止，但青年對爵士樂的熱狂，正說明其內心強烈的苦悶，欲藉以否定或逃避共黨政權的存在，從社會主義的束縛下得到一種遺忘的解脫。直到近年來，各國乃對爵士樂採取管制下的放寬政策，以容納並引領青年不滿情緒的發洩。

此外，東歐青年固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情形有所懷疑，但擺在眼前的「現實」則根本否定了黨一切宣傳，也推翻了社會主義空中樓閣的臆想。在徬徨與迷惑之中，乃習於倣效阿飛行爲而向各該國政權發出公開的挑戰。

東歐阿飛主義的盛行，固然有其一定的社會的原因（註五），同時更有其政治的意義——這種現象反映青年對政府、組織、黨八股宣傳、單調空洞的社會、及一切現狀不滿的抗議。青年與上一代之間有基本價值觀念的背離，有種種緊張的對立情緒滋蔓，並且有種種實際的利害衝突存在，這一切背離、對立和衝突匯聚累積的結果，乃在政治、社會、心理各方面產生一種代間緊張的現象，經由文學、戲曲、藝術諸般形式表現出來。所以，黑魯曉夫雖認爲「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可能產生代間緊張」，但無疑這只是泯滅理智、抹殺事實的一種教條式的宣言。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青年問題發生於共產國家，比之存在於西方實具有更大的腐蝕和糜爛力。

三、貶史運動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逝世，緊接在其終禮告別式之後，蘇聯統治者即迫不及待地發起「貶史運動」。就東歐而言，貶史運動的主要內容一方面為不再以警察、恐怖為政府正常施政手段及物質鼓勵的代用品，換言之，即政府開始以勸導和報酬的方式以達成其要求，給予人民較大行動餘地。再方面則為蘇俄顧問的撤回，容許各國依其自己選定的途徑建設社會主義，換言之，即各國的差異性被承認並得以發揮。其後，南斯拉夫迫使蘇聯讓步，匈牙利、波蘭革命的興起，大概都受到這兩種措施的鼓勵，而東歐自由化傾向也是以此為發軔。當然，貶史運動絕不表示蘇聯或東歐共黨放棄其既定文化政策，只是當初它們迷信宣傳和整肅的效用，最後乃不得不在蓬勃的文化發展下作相當的讓步。

貶史運動的反響是多方面的，其演變和發展也是多層次的，先是以史達林為共產主義的替罪羔羊而痛加撻伐，其後轉以當時政治形勢為批判對象並提出若干改革要求，終而超越黨與政府的羈絆開始向人生哲學的領域進軍，要求解放的呼聲日益高揚，在貶史的護身符下，各國作家、藝術家乃大膽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面，並試圖與西方接近，其間雖屢經壓抑，終仍匯為文化的解凍，使東歐自由化與西歐化傾向愈顯分明。

四、西方廣播

上述內在的反抗勢力與西歐各方面發展之影響，兩者實相輔相成。西歐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成就動搖了蘇俄的控制力，西方廣播與相互文化交流及觀光旅行對東歐社會文化的改變更顯著地有著推波助瀾加速其成功。

西方廣播穿透鐵幕，揭發共黨的虛詐，使東歐人民獲得與西方在精神上的交往，而共黨政權新聞和情報的獨佔性一旦破壞，其極權統治自得以維持，故各國共黨對此乃極力破壞干擾，不遺餘力。

廣播中對東歐影響力最大者，當數美國主設於慕尼黑之「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該電台以波蘭、捷克、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多種語言每日廿四小時播音，包括新聞報導及評論、婦女節目、青年節目、知識份子節目、西方運動介紹、現代及古典音樂欣賞等。

一九六四年，波蘭三十四名知識界領袖因聯名抗議檢查制度之嚴重妨害

思想自由，而面臨華沙逮捕之危機，經向西方投訴，西方乃透過廣播加以揭發，當局遂被迫勉作讓步。此最可見西方廣播的效力。

五、觀光事業與文化交流

觀光事業與文化交流同樣敲開了東歐閉塞的大門。

各國為爭取外匯乃鼓勵觀光事業。西方旅客大量湧進的結果却引起東歐若干必要的改革。如當局必須投資及訓練人員經營國際性觀光旅社，旅客服務及交通改善使當地人民有要求同樣便利的權利。西方旅客的生活享受更在東歐人心中掀起鉅大而持久的波盪，汽車、衣著、手錶、像機、鋼筆等等，都是他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這更加强了他們衝破鐵幕、回歸西方的意識。

文化交流可說是觀光旅行上一層面的活動，而直接以東歐社會的中堅份子為影響對象。自一九五六年後，西方學者得以進入東歐從事研究，藝術家可以在各地展出其作品，東歐學者時被邀赴西方國家，雙方來往日趨繁密，對於與世隔絕十年以上的東歐知識份子實有著可觀的震撼和啟發作用，其影響所及更難以估計。

(四) 民族文化的復蘇與東歐文化現況

一九五六年，由於黑魯曉夫宣稱各國可以經由自己決定的路線從事社會主義建設，東歐各國彼此的差異性乃表現得更為尖銳，狹隘的民族主義遂推動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許多重大變遷，而民族文化亦再次抬頭。

南斯拉夫率先實行民族自治，波蘭的天主教會亦試圖恢復其在政治上的傳統的影響地位，斯拉夫人開始爭取與捷克人的平等，捷克人則極力振興民族文化的光采，匈牙利人更羣往維也納追懷昔年奧匈帝國的盛景，這種文化上的本土運動表現得最為積極、最為突出、也最富代表性的，則仍推羅馬尼亞。

一九五九年迄今，羅馬尼亞在文化上有三項彼此相關的發展：①排除蘇維埃文化，②重新與西方接觸，③恢復民族固有傳統。

六十年代以來，羅馬尼亞變更了許多公園、街道及工廠的蘇俄式或共黨意味的命名。布加勒斯特市中央史達林的巨大塑像被拆除，「羅蘇友好協會

「會館被以整修爲名而關閉。俄語的重要性爲其他外國語所取代，羅馬歷史學家更主張「社會主義」並非外來的輸入品，而是羅馬尼亞本身自十九世紀以來逐漸發展而成的產物。羅共一九六四年新黨章對十月革命無隻字之提及，中央委員會更公開宣稱蘇共無權審判他國共黨。」

一九六三年七月，羅共停止對西方廣播的干擾，同時出版一「世界週刊」(「Lunea, "or" The world」)，其大小、格式、照片、彩色均仿如「時代雜誌」，內容亦轉載西方報導。西方文學禁令亦解，當局將西方文學分爲三類：立意反對資本主義的，雖非有意但實質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及親資本主義的。羅共自一九六四年起即大量翻印前二類作品。

同上時期，羅馬尼亞傳統文化亦呈現復興景象。一九五二年開始的斯拉夫語化文字改革被廢止，重新着重羅馬尼亞語的拉丁語源及習慣用法。境內的少數民族如猶太人、撒克遜人、匈牙利人每可自由離境。一九六二——六四年間，羅國並發掘若干歷史上的傑出人物(註六)，古典作品也大量出世。羅共總書記(Ceauscu)一九六五年五月在一次作家會議中更宣稱過去的成就將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實現。

此外，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之頗爲近似，唯阿爾巴尼亞及東德則相去較遠。阿爾巴尼亞地狹民貧，非依附外力不足以圖存，東德則受西德之威脅，苟作任何讓步，必失却其對內之控制力，亦不得不繼續受制於蘇聯。

總之，東歐與西方之接觸仍將繼續增加。匈牙利、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均已先後全部或局部中止干擾西方廣播，這項措施除使人民得自由收聽外，並激起各國報紙及電台之變革與競爭以吸取聽衆。雖然在可見之將來，東歐仍不可能有新聞自由，但無疑其報紙、廣播之教條性將減低，檢查亦將較寬泛，而且必須迎合聽衆興趣。

觀光事業的發展，各國將得到外匯而犧牲原則，因爲旅客增加將使若干種行業轉歸私人經營，如某些工業、計程車、飯店旅社、鞋店、服裝業等。

在教條主義衰頹與民族文化振興之同時，教會亦取得較大自由。除阿爾巴尼亞外，各國主教均獲允出席天主教全教會會議，神職的任命亦較前便利，南斯拉夫並於一九六六年與教廷締結教約，成爲第一個簽定教約的共產國家。僅波蘭因天主教教徒甚衆，主教影響力極大，當局乃有所顧忌而繼續其壓抑。

文學家、藝術家的創作也得到相當的自主，知識份子重新肩負一部分對社會的批評與推動的職責。檢查制度與教條限制雖仍存在，但機敏的作家已可借小說或詩歌而技巧地表達其思想。

大學教育水準與學園自治亦漸次恢復，除保加利亞外，各國均不再以階級成份爲入學條件，課程重新調配，波蘭大學甚且一度廢止馬列主義課程。教育方面改變最烈者，當爲捷克。捷克於一九六六年經由立法程序改變以蘇俄爲藍本之大學制度，盡復一九四八年以前的舊規，如教授團之選舉、學位之頒發、大學之學術自由、入學標準等皆屬之。

綜上所述，可知東歐社會文化今後仍將有大幅度的變動，而①民族文化之復興，②排除蘇俄影響，③傾向西方，則是左右其發展方向之三大主要因素。

× × ×

註一 以南斯拉夫的Lovinescu人爲例，他們從九世紀起受德人統治達一千年之久，及後一旦脫離德人束縛，立刻恢復了幾被湮滅了的傳統的語言、文法和文學，並且對自己固有的宗教和文學持有一種與生俱來根深蒂固的喜悅。

註二 茲爲討論之便利，將各國淪入鐵幕之時間記載如下：波蘭，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二日；羅馬尼亞，同年八月廿三日；保加利亞，同年九月九日；南斯拉夫，同年十月廿日；阿爾巴尼亞，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其餘匈牙利、東德、捷克則分別爲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五月八日、五月九日。

註三 意第緒語(Yiddish)乃德語、希伯來語、斯拉夫語的混合語，是中歐和美國猶太人用的語言。

註四 巴伏洛夫(Pavlov)係俄籍諾貝爾獎金得獎人，他根據對大類的實驗，認爲人類一切行爲都是單純的反射行動。布爾什維克即竊取這種理論加以附會爲其唯物主張的科學基礎，以爲個人係由物質環境所塑造，隨環境而改變，從而可能創造其所謂社會主義人類。

註五 如大批婦女加入工業生產行列，子女乏人管教。戰時破壞及大量農村居民湧進都市，使都市發生嚴重房荒，從而形成許多家庭及社會問題。

註六 如外交方面的Titelescu，歷史研究方面的Iorga，社會學方面的Gusti，詩歌方面的Octavian Goga(按：此人原係法西斯鐵衛隊份子)，戲劇方面的Lovinescu等。